



论考古学发展与中国古典学的实证重建

田旭东

摘要:20世纪初,疑古学派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怀疑,是中国当代古典学兴起的重要诱因。其后,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为重构古史系统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约略同时,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并迅速发展,从三个方面推动了古典学的演进:其一,为古典学提供了重建上古史的物质性框架,改变了有关中华古文明的狭隘认识;其二,大量简帛佚籍的出土,回应了疑古思潮的质疑,进而证明中国学术史重写的必要性;其三,考古学发现的遗迹、遗物,为古典学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在当代学术语境下,考古学将继续为古典学提供新方法、新材料,不断催生出新的问题意识,驱动古典学研究范式的更新,从而促使当代古典学走上更加科学的道路。

关键词:古典学;疑古思潮;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52;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3-0015-09

“古典学”(Classics)作为西方人文教育的基石,是一个复合的学科概念。它聚焦于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统摄古典语文学、古代史、古代哲学等若干相关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古典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时至今日,它仍在世界许多顶尖学府和研究机构的学科版图中占据一席要地,持续塑造着人文学科的演进脉络与发展走向。

相较于西方,中国古典学的兴起相对较晚。那么,何谓中国古典学?近年来,学术界有关中国古典学的讨论颇多,对其理解和界定形成多种观点,比如,裘锡圭先生认为中国古典学就是对上古典籍的研究,并将其范围限定在先秦秦汉时期^①。刘钊、陈家宁认为“古典”不应仅限于古书,而是指汉代以前的中国古代文明^②,这与李学勤先生倡导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相一致,即从先秦至汉代的古代文明^③。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古典学以揭示和阐释中华文明形成、演进历程及其发展规律为根本目的。”^[1]诸家

之言甚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综合以上,笔者倾向于黄德宽先生的观点:“中国古典学应以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和上古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这与西方古典学以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献和古典文明研究为根本任务颇为相似。我们所谓的‘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指的是先秦时期原创的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基础文献,不仅指历代公认的儒家经典、诸子百家,还包括先秦时期所有与中华文明有关的文字记录。同时,两汉以降,先秦元典性文献的传承传播以及历代整理研究和阐释成果,体现了先秦元典性文献对中华历史文明传承、演进的深远影响,也应作为中国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先秦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古典学以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元典性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就抓住了根本。我们所说的‘上古文明’,主要指处于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关键时期的先秦文明。中国古典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从中华文明曙光初现的传说时代到有

收稿日期:2025-11-04

作者简介:田旭东,女,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陕西西安 710069),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先秦兵学、出土文献研究。

文字记录的夏、商、周(西周、东周)时代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学术研究领域,作为中国古典学基本任务的‘上古文明’研究,指着重于以先秦元典性文献为基础、结合考古发现所开展的先秦文明研究。”^[2]因其内容涵盖古代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内容,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中国的古典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

孔子曾经因为文献不足而感叹礼制难征,这正反映了传世文献的有限性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深度制约。回顾百余年学术史,考古出土的遗迹、遗物以及文字材料,从多维度推动了古典学的演进。今天,在倡导世界古典学对话的学术背景下,考古学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必将会助力中国古典学的发展,引领古典学走向更加科学的未来。

一、疑古思潮的兴起与中国当代古典学的生成

辛亥革命前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由此引发的史学革命,使传统的古史系统遭到了破坏,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疑古学派”的形成,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他们以《古史辨》为阵地,对传统的古史系统展开了深刻而全面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长期以来坚守的中国传统古史体系^④。1923年,顾颉刚先生写成《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⑤的重要论断在史学界掀起波澜,同时也标志着“古史辨”学派的正式形成。此后,以这几位先生为核心,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考证工作,诸多古代典籍的真实性因此受到质疑。

自康有为提出“上古茫昧无稽”^⑥的观点以后,中国上古社会究竟是怎样一种图景?是如何发展至今的?这些问题成为当时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古史辨”学派以疑古思想为核心,对先秦历史及其发展过程作了深度剖析,其研究成果就体现在《古史辨》中,从1926年到1941年的15年间,《古史辨》一共出版了7册,汇集了考辨古史真伪的论文350多篇,当时史学界的著名学

者几乎都参与其中。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到,这一学派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历代辨伪疑古的传统,对上古至两汉的典籍都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了先秦史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上古史的记载是神话传说的结论,由此打破了人们对沿袭两千多年的古史系统的信念。从方法论上讲,或许也可以认为,疑古思潮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范式,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史学研究。徐旭生在1943年就指出:“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时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史学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3]即使在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间,这种情况仍在继续,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几乎无法避免《古史辨》的影响。

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陷就在于以古书论古书,未能跳出文献内证的自洽闭环。所以,在疑古思潮兴起的同时,一些学者就意识到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出路应该是积极建设,而非无休止、无根据的怀疑。在这种治史思路的指引下,他们开始积极探寻新的理论与方法。因此可以说,疑古思潮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大胆质疑,构成了当代中国古典学兴起的重要诱因。它促使学术研究从对经典史书的被动接受转向批判性审视,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古典学从材料、方法到范式的全面重建。

经由“古史辨”洗礼之后的古典学体系,其重建之路应立足于怎样的客观基础?首先必须提及的是王国维创立的“新证”之学,即“二重证据法”^⑦。1925年2月,王国维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同年7月,他应学生会邀请,作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讲演,明确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出山东曲阜县),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的古器物、古文字之学。”^[4]由此可以窥见他强调出土文献对突破传统研究、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作用。此后,王国维在开设的古史新证课程中讲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

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5]2}此即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为新史学研究指明了一条具体路径。在该方法引导下,王国维搜集整理了当时近二三十年新发现的材料,并结合学者研究成果,将其分为五项,即殷墟甲骨、敦煌及西域简牍、敦煌写本、内阁大库档案,以及流散于域外的古民族文字遗存。其中前三项他都有深入研究,凭借百万余言的著述,在相关领域取得了卓著成就。由此可见,“二重证据法”是他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实践基础之上,对自身研究方法与经验的提炼与总结。

1927年,王国维的学生姚名达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讲道:“王静安先生批评先生,谓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6]从中可以看出王国维对疑古学派所持的审慎态度,这也是他多年致力于古史“新证”学术实践的真实写照。他说:“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5]2}为此,他提出两点看法:第一,“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5]2-3},此立场与疑古学派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往往以某一时代找不到有关文献产生的足够证据为由,便倾向于全盘否定其历史真实性。疑古学派的方法曾遭张荫麟等人指摘,被视为不科学的“默证法”。与之相较,王国维更强调实证材料的支撑,他认为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也许可以证实文献记载的不谬。这一点已得到充分证明,一些原来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为“伪书”的文献,已因大量出土文献的佐证而恢复了可信性。第二,即使在整体上不能证明某种文献的可靠与否,亦不妨碍从其局部获取可靠的材料。他认为“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5]2},“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5]52-53}。他这种对文献审慎且辩证的态度,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在“古史辨”运动风靡一时、疑古思潮盛行的学术氛围中,王国维以冷静的态度,提出“二重证据法”这一科学的治史方法。该方法强调

地下材料与纸上文献相互印证,他以自身出色的学术研究进行实践检验,为古史系统的重新构建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对后世中国历史学、文献学乃至考古学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考古学对当代中国古典学的推动

如果说疑古思潮对传统古史观念进行了一次大清理,有力地破除了旧的古史系统,为建立新的古典学开辟了道路;那么,王国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论断及“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使学者们深刻认识到,原来所谓“纸上之学问”实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这也是考古学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最汹涌澎湃之时进入中国,并为中国学者所接受的根本原因。自彼时至今日,百年的古史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即对疑古思潮构成最大挑战的正是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而新的古典学的构建必然依赖于考古学的发展。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受西方现代考古学启发,我国学术界实现了由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的转变。此后数十年间,中国现代考古学以丰富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有力地回报了疑古学派的“扫清道路”之功。与之同时,中国古代文明、中国古史系统,即当代中国古典学,已在考古学者的手铲之下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考古学为古典学提供了重建上古史的物质性框架,拓宽并深化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

长期以来,传统观念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时空问题的认识较为片面,尤其是疑古学派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拦腰截断,认为东周以上没有信史,中国古代有确切记载的历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与古史系统的认知。而20世纪初考古学所取得的一系列新成就,无疑改变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传统看法,更有力地冲击了疑古思潮。

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及20世纪20年代以来安阳殷墟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以及随之而来围绕甲骨文、殷墟遗迹和遗物开展的研究,不

仅为商代后期的历史文化奠定了基础,更以考古证据证实了《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代历史基本可信。由此推之,《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夏代历史的记述同样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既然甲骨文被确定为商后期的文字,殷墟遗址被确认为商后期的都城,那么它的前身是什么?在哪里?考古学者对此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从20世纪50年代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的发现开始,70多年以来,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邢台东先贤遗址、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三家庄遗址等相继被发现,证实了存在早于殷墟的商代前期文化,而且后者确系从前者发展而来。伴随着商代前期都城遗址的确认,其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也日趋清晰,从而使重建商代前期的社会文化图景具备了条件。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者又为寻找夏文化付出艰辛的努力。从1959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开展了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主的调查和发掘,之后又相继发现与此类文化内涵相同的郑州洛达庙、晋南汾河流域陶寺文化类型的各个遗址。这类文化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大约北起晋西南地区,南达长江北岸,东起豫东地区,西达陕西华县,纵横均已超过千里。从年代来看,它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再从文化特征、文化来源以及社会发展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从龙山文化到商代文化之间的演进链条已被清楚地揭示出来,可以认为这种考古学文化就是夏文化,夏王朝的存在已不容置疑。

1977年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距今4000年左右,应属夏纪年之内,城址地望近于文献所载的“禹居阳城”“禹都阳城”“夏都阳城”的范围。此外,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等年代相近的城址,都可将对夏文化的认知视野推至文献所载的禹、启时期。

从20世纪20年代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探索开始,考古学者在全国数省范围内发现大量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龙山文化遗址,特别是其中的城址,如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郟城郝家台遗址、辉县孟庄遗址,山东寿光边线王遗址、邹平丁公遗址、阳谷景阳冈遗址,陕西榆林石峁遗

址等,大大增加了五帝时代为信史的可能性。

考古发掘中常见的龙山文化遗存与仰韶文化遗存之间的叠压关系,为我们将中国历史从龙山文化上溯至仰韶文化提供了材料支撑,充分证明中国文明拥有独立的起源。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相互印证、彼此衔接,构建起从五帝传说时期到夏商周三代较为完整的文化序列,使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上古阶段有了可靠证据。

在中原以外的广大地区,与龙山文化遗址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如同满天星斗,诸如西北地区有大地湾文化;东北辽河流域有红山文化;长江上游有三星堆文化,中游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下游有良渚文化等。就商代而言,在中原以外也存在着文明程度很高的地区,例如三星堆商代祭祀坑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掘,都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精美文物。周代考古成果与文献记载能够形成更为充分的互证,西周时期的都邑遗址,如岐周、丰镐、成周等,以及晋、虢、应、郑、卫、燕、齐、楚、秦等诸侯国都城,还有吴越、巴蜀等区域文化的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周代文明格局的认识。这些材料清晰地表明,以往以“中原中心”为代表的文明起源单元论,已难以契合实际情况,需要予以修正。中国古代文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依托,许多地区的考古文化演进情况已经逐渐清楚,各种文明要素产生的过程趋于明朗,中国古代文明是多元并起、相互促进的。考古学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时间与空间的传统认知,也进一步推动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特质与发展道路的深入理解。

其次,考古发掘的大量简帛佚籍,是对疑古思潮的一大冲击,进而证明中国学术史必须重写。

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多地陆续出土了大量简帛文献。其中既有楚系简帛如长沙子弹库帛书、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也有秦系文献如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以及众多汉代简牍,包括马王堆帛书、张家山汉简、银雀山汉简、阜阳双古堆汉简、尹湾汉简、定县八角廊汉简等。此外,近年入藏的上博简、清华简、北

大简、安大简等,虽非正式发掘所得,但确为古籍无疑。这些简帛佚籍大多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年,无论是出土数量还是文献价值,均远超历史上的孔壁中书与汲冢竹书。它们的面世,让我们得以窥见未经后世传抄、篡改的先秦古书原貌,也使得人们不得不考虑先秦两汉学术史重新书写的必要性。

在这里,我们将清华简作为典型例子进行介绍。从现已整理出版的15册内容看,多为经史类典籍,包含诸子思想、历史文化、天文历法、律法算术、医学方技等内容,尤其是一些过去从未见于记载或被先秦文献引用却没有流传下来的书类文献,为学术界拨开迷雾、去伪存真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以下从四个方面简要介绍。

第一,清华简中发现了一大批书类文献,例如《尹诰》等佚篇,让真正的古文《尚书》重见天日,证实了部分传世古文《尚书》的确为“伪作”。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看到了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为长期以来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一个圆满句号,这对经学史研究影响深远。

第二,清华简中的许多历史类文献为人们揭开了诸多历史谜团。例如,以《系年》《楚居》《越公其事》《郑文公问太伯》等为代表的篇目推进了秦人起源、楚国诸王居所、两周之际郑国历史等先秦史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其中很多篇目的内容可与《左传》《国语》《史记》进行对读和印证。例如《系年》清楚地记录了秦人祖先从东方西迁到甘肃一带的缘由和历史,促使秦人来源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第三,清华简中有不少内容涉及思想史,包括治国理政、阴阳五行、天人关系、辩证思想等思想理论。例如:《金縢》记载了周武王生病时,周公向先祖祷告之事,呈现了西周早期“天人交流”的具体实践;《畏天用身》则进一步深化了天人关系,主张天与人相辅相成、相互依凭,从而凸显出人在天命框架下的主体性与责任感。此外,《保训》《五纪》《两中》等篇,都不同程度、不同维度地涉及“中”观念,共同织就了一个丰富的观念网络。不仅为解读西周政治治理的内在理路提供了直接依据,也为后世儒家所提倡的“中庸”思想找到了文献渊源。

第四,清华简中有些内容体现了早期礼乐文明。例如:《周公之琴舞》直观展现了西周初年宗庙典礼中诗、乐、舞紧密配合的演出情景,为解读周公制礼作乐、周初政治文化等提供了文献支撑;《大夫食礼》《大夫食礼记》是礼仪文明渊源的实证,这是已经散失的先秦礼书在战国竹书中的首次发现,再现了战国时期礼书的原始面貌;《五音图》和《乐风》以图文形式呈现了先秦时期的乐理体系,被认为是目前所见的抄写时代最早的音乐文献。这些文献的相继出土,层层揭开了中国礼乐文明源远流长、体系完备的历史图景。

以上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与研究,推动了古典文献与学术史研究范式革新。过去崔述以经书的记载来驳斥诸子百家所载古史;康有为以六经均为孔子为了托古改制的需要而作,将孔子以前的远古文化一概抹掉;胡适以“上古史不可靠”为由,主张搁置唐虞夏商时期的传统记载,将论述起点定于《诗经》时代;顾颉刚的中国古史“层累造成”说,颠覆了历史认知的时间轴线等,这些学者有一个共同的学术倾向,即普遍将先秦典籍的成书年代向后推移,甚至把诸多文献判定为刘歆伪作,或更晚时期的伪造文献。几十年间大量的简帛佚籍的发现,证明了先秦两汉的许多古籍并非全伪。这也促使我们要更加重视对古典文献的整理、校勘、注释及研究,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处理好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关系,从史料、思想、学术等多维度做出综合性的研究和价值判断,以实现李学勤先生“重写学术史”的目标。

最后,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为古典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极大地丰富了古典学的研究内涵。

考古学是一门通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收集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揭示其文化内涵,并以此来研究和重建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学科。面对诸多上古史问题,仅靠文献记载无法获得答案。可以说,我们今天对古代中国的了解还十分有限,而更多未知的内容,需要借助考古发现,并尽可能运用“二重证据法”或进一步的“三重证据法”^⑧乃至“五重证据法”^⑨才能一一显现出来。

由于不同古代文明所依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存在差异,其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文明要素及呈现形式也各不相同,充分体现出各区域文明社会发展格局的多样性。过去我们总认为城邑是农耕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的中心,是社会结构的物化形式。而对非农耕民族,比如游牧民族来说,它可能就不适用,陕西榆林的石峁遗址即特殊的一例。石峁遗址地处陕晋高原的黄河岸边,远离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的聚集地,至今仍沿袭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而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晚期就有如此巨大的城址,且文明程度并不亚于同一时间段的中原地区。那么,它能否作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性遗址之一?

王震中、夏虞南在《中华文明形成标志的重新界定——兼对“古国”等概念辨析》一文中提出了“都邑说”,认为“都邑(都城)是中华文明形成的物化标志。”^[7]但此文以良渚、陶寺等典型农业文明遗址为例展开分析,指出在都邑与城市起源这一问题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存在明显差异:历史上游牧民族在政权建立初期,都邑并非其必需的社会条件。那么“都邑说”是否适应半农半牧的石峁遗址呢?该文进一步指出:“以都邑(都城)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一般情况下需要在考古中发现城墙……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在城内发掘出:(1)宫殿等大型建筑物;(2)贵族与贫民阶级分化的墓葬和居址等资料;(3)高级手工业作坊。此外,城邑还需具有5000人以上的人口规模。”^[7]

具体分析石峁城址,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它具有工程庞大的建筑,遗址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石构城址组合而成三重城墙,还发现装饰墙体的壁画和在城址修建过程用于祭祀或其他礼仪活动的玉器与头骨遗迹。第二,遗址中可见阶级或阶层的划分。以墓葬为例,根据葬具、陪葬物、殉人、壁龛等标准可将石峁遗址的墓葬分为四类:第一类墓葬有葬具、壁龛、殉人,墓葬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墓主多葬于木棺内,棺外有殉人、殉狗,壁龛内随葬有陶器;第二类墓葬分为有葬具、有壁龛和有葬具、有殉人两种;第三类分为

有葬具、有壁龛、有殉人三种;第四类无葬具、壁龛、殉人、殉狗及随葬品,规模最小^⑩。此外,石峁东门遗址的下层地面多处发现有头骨,其中K1、K2均集中埋葬有24个头骨,其身份多为年轻女性,部分头骨可见明显的砍斫与火烧痕迹,学术界据此推断这两处头骨坑极有可能是当时城墙建造过程中举行奠基或祭祀仪式所留下的实物证据^⑪。这些迹象从侧面反映了在粗暴凶残的仪式背后,依稀可见的社会复杂化倾向。

此外,石峁遗址有大量精美的玉器出土。对玉石手工业的控制,对玉产品的消费,突出体现社会权力。石峁玉器中的一些品种,如圭、璋、璧、钺等,均属于礼器,礼器则是伴随文明的产生而出现的,这也从另一方面昭示出石峁遗址并非一般的大型聚落。另外,在皇城台区域、内城及周边区域、外城东门附近都发现有制作玉器、石器及陶器的手工作坊遗址。我们通过“古物”来认识古人和古代社会,从物质文化反映出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来看,可以说石峁遗址符合“都邑说”的几大条件,已经从大型聚落形态演变到了都邑(城市)阶段。它完全可以作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性遗址之一。

石峁遗址是未被文献记载、仅通过考古工作得以揭示的典型实例,类似例子不胜枚举。2025年6月以来,在学术界乃至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的“朶日塘秦刻石”^⑫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之疆域:“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8]这里明确指出秦国的最西边在“临洮、羌中”,即今天的甘肃省东南部和青海省东部一带。而朶日塘秦刻石却远在秦边境之西数千里以外。如何解释这不见文献记载却又实际发生过的现象呢?有学者指出:“朶日塘秦刻石文字可见‘皇帝/使五/大夫臣□/将方□/采樂□隃’,刻石的空间位置,反映了秦时遣人‘采药’远至青海高原接近河源地方的努力,可以从新的视角说明秦人的天下观与地理意识、秦执政集团有关疆域的理念。……见‘皇帝’‘使’‘将方□/采樂’的‘五/大夫臣□’,其‘车到此’的行迹,以秦朝廷行政官员远途艰辛行进,可以看作是秦人超越所谓‘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的疆域,远出‘徼外’‘西涉流沙’‘北过

大夏’(《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政治理想的表现。与秦人宏大方位观相应的,是超长距离的大地测量技术。”^[9]可见,新的考古发现常常带来惊喜,不断深化与丰富着已有的认知。朶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及其在学术上的合理解读,为秦史与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与视角,有望推动这一领域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上述例子说明,文献的记载是有限的,考古新发现总是能够为我们填补认识盲点或修正历史的成见提供条件,从而丰富古典学研究的内涵,从方法论上提示我们在从事古典学研究时,不能仅局限于文献记载,更要重视文献以外的考古发现,不只“二重证据”,甚至需要更多重证据综合研究。

此外,在考古发现中我们还看到越来越多的礼仪性遗迹,如祭坛、祭祀坑、神庙等,还有墓葬壁画、帛书图像、祭祀法器、封禅玉牒、禱病玉版及简牍帛书中大量属于数术的文献,这为我们理解上古神话及古人的宇宙观、天人观、宗教信仰等提供了新材料,过去那种认为考古遗址难以窥探古人精神世界的看法必须予以改变。

总之,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古代社会及古人丰富多彩生活的真实材料,大大拓展了古典学的研究范围,使我们更有可能探索古代社会发展的机制与规律。

三、考古学促使当代古典学走上更加科学的道路

如果说古典学的文献记载、古史框架为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阐释背景的话,那么考古学则为古典学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材料,同时激发新的问题意识,推动古典学研究范式的更新,使其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动态发展的现代学科。

曾经有国外学者批评中国考古学有传统“编史”倾向^⑧,这里要强调的是,以流传至今的文献与考古发掘所得资料相印证,正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特点。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没有脱离文献的记载,1926年李济先生之所以选择在地处晋南汾河流域的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首次发掘,正是因为《史记》记载的尧都平阳、舜都

蒲坂、禹都安邑几个都邑均在这一范围内。他不能抛开文献记载,而盲目地去其他地方寻找尧舜禹的遗迹。早在李济之前,王国维对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的研究,证明《史记》所载商人先公先王不伪。此后,殷墟大量遗迹、遗物的出土及长期研究,进一步表明《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代历史基本可信。同样,1958年徐旭生先生从文献出发探索夏文化时,依据《史记·夏本纪》所载,到豫西和晋南一带寻找夏人活动的遗迹。后来发掘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用考古学事实证明了夏王朝确实存在。

今天考古学所用的方法除了传统的地层学、类型学以外,还广泛借鉴自然地理、地质、气象和自然生态等学科,这些学科可为考古学提供特定地区的地理与生态资料,以便探讨特定时期的自然环境。自然科学可为考古学提供技术借鉴,在大量吸收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技术的基础上,考古学已经拓展出多个分支,如科技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水下考古等。出土的实物资料也可用现代科技检测方法进行断代研究,比如碳-14、热释光、古地磁学、电子自旋共振、铀系同位素、钾氩、裂变径迹、氨基酸消旋技术等。还可对实物资料做结构分析,如热分析、脱玻化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衍射、红外吸收光谱、核磁共振、数码摄影分析、化学元素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均已应用于出土实物的分析鉴定。其他如遥感技术、空中勘测技术、物探技术、水下勘测技术的应用,更使现代考古学超越田野发掘的基本属性,成为一门跨学科的交叉学科,从而使我们获得的实物资料更加精确,提取的历史信息更为丰富。新方法和多学科方法的应用,不仅提升了考古工作的效率和精度,还为复原古代社会生态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无疑将推动古典学进一步发展。

我们在充分肯定考古学材料与方法独特价值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考古学同样具有自身局限性。首先,考古发现是不完全的,很多时候是偶然的,它只能局部地反映某个时期人们物质生活的某个方面。我们今天不可能单纯依靠考古发现来全面揭示古代社会的整体面貌,也不能完全凭借考古发现来探索古代社会发展的机制与规律。所以,仍然要回归王国维

的“二重证据法”或更多重的证据法,关于这一点,李学勤先生主张在新旧学术大转折、现代科学奠基、多学科交叉这一宏大学术背景中去看待王国维及其“二重证据法”,他在多篇文章中都讲到王国维先生“开中国现代考古学之先声”^④,是“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先驱”^⑤。针对学界对考古学独立性、本位性的呼吁,他又发文强调:“讲历史学与考古学相辅相成,绝不意味着抹杀两者中任何一方的独立性。有学者提醒中国考古学不要陷于历史学的‘偏向’,考古研究有本身的天地,不可限于对文献的证实或证伪,这当然是对的。然而考古研究终究是广义的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其所有成果归根结底是增进人们的历史的理解和认识。”^[10]

我们今天的考古学,是建立在现代新科学、新条件基础上的考古学。它要求我们用同等严谨、科学的视角对待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精确系统地分析其特点。二者相结合,加上中间的多重链环,才能对文明史上的诸多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处于这样一个考古大发现的年代,只要我们对建设古典学有充分认识和宏观把握,以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为指导,古典学一定能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结 语

中国古典学在怀疑与实证、反思与建设的张力中不断自我超越、发展。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迫使研究者跳出默证的传统思路,直面文献生成与历史本真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为其现代转型奠定了问题意识基础。“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正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回应。它不仅是方法论上的创新,更标志着一种新史学观念的崛起:历史事件的确认,必须经受地下与地上双重材料的检验,从而将古典学从文本阐释的内部循环,引向更为广阔的历史现场。

考古学的介入,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古典学走向深入。其推动作用体现在三个维度:在认知框架上,考古学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石,构建起一个独立于文献叙事的、客观的物质文化发展序列。从星罗棋布的史前聚落到恢宏壮丽的三代都邑,考古发现以实物的语言,书写了

一部“无字地书”,重塑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早期发展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宏观图景,打破了传统史观中单一中心论的狭隘想象。在文献根基上,不断涌现的简帛佚籍为“二重证据法”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石,这些未经后世篡改的“原始档案”,不仅直接验证或修正了诸多传世文献的观点,有效回应了疑古思潮的具体质疑,更揭示了大量湮没无闻的思想流派与知识体系。它们迫使学术界承认,我们所熟悉的先秦两汉学术史,只是一个经历了历史筛选的“结果”,而其原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必须结合这些地下新材料予以重写。在研究范式上,考古学发掘出土的遗迹与遗物,为古典学注入了坚实的“物”的维度。礼器、兵器、城址乃至植物遗存与动物骨骼,所有这些沉默的证据,使得我们对古代社会制度、经济生活、技术工艺、信仰观念乃至环境互动的探讨,得以超越文献的字面描述,进入一个可观察、可分析、可验证的实证阶段。

在日益强调“数智人文”的当代学术语境下,考古学与古典学的对话必将持续推进。这意味着,中国古典学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整合多学科研究方法,旨在全面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复杂进程的综合性学科。这条道路,始于对传统的深刻反思,兴于多重证据的求索,并最终指向一个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在实证与阐释之间建立创造性平衡的未来。它不仅致力于更清晰地照亮华夏文明的来时之路,也必将为思考人类文明的普遍发展规律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

注释

- ①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出土文献》第4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1—14页。②刘钊、陈家宁:《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③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④引自笔者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本文部分内容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在行文过程中略有调整。⑤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⑥康有为:《上古茫昧无稽考》,载《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页。⑦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⑧饶宗颐:《谈“十

干”与“立主”——殷因夏礼的一、二例证》，《文汇报》1982年5月11日；该文后来以《谈三重证据法——十干与立主》为名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1《史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3页。⑨饶宗颐：《〈谈三重证据法——十干与立主〉之“补记”》，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1《史溯》，第13页。⑩裴学松：《石峁文化墓葬初探》，《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⑫尕日塘秦刻石，位于中国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是青海黄河源区发现的中国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刻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字区面积约0.16平方米，距地面约19厘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皇帝/使五/大夫臣□/将方□/采樂□/隄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2025年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全涛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正式公布了尕日塘秦刻石这一发现。⑬Lothar Von Falkenhausen.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Vol. 67, No. 257, 1993, pp. 845-847; [美]洛沙·冯·福尔肯霍森著、陈淳译：《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⑭李学勤：《论三重证据法与三星堆的意义——饶宗颐先生三文“读后记”》，《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文末记写作时间“1995年9月”。⑮李光谟编：《李济与清

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序言第Ⅷ页；又见李学勤：《李学勤文集》卷25，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32页，文末记此序写于“1993年8月”。

参考文献

- [1]黄德宽.楚简《诗·召南·驹虞》与上古虞衡制度:兼论当代古典学的构建[J],中国社会科学,2023(12):77.
- [2]黄德宽.关于中国古典学构建的几点认识[EB/OL].(2024-11-08)[2025-10-10].<https://www.ctwx.tsinghua.edu.cn/info/1072/3220.htm>.
- [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增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23-27.
- [4]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J].学衡,1925(45):1.
- [5]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 [6]顾潮.顾颉刚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39.
- [7]王震中,夏虞南.中华文明形成标志的重新界说:兼对“古国”等概念辨析[J].中国史研究,2025(1):23-45.
-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308.
- [9]王子今.刻石发现与秦史秦文化研究的推进[N].光明日报,2025-09-29(07).
- [10]李学勤.“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5-6.

On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y and the Empir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Tian Xudo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Yigu School questioned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Classics. Subsequently, Wang Guowei put forward the “Dual Evidence Method”, which blazed a new trail for the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history. Around the same time, modern Chinese archaeology emerged and developed rapidly, advanc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in three ways: firstly, by providing a material framework for reconstructing early ancient history, it transformed the narrow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secondly, 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numerous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it has greatly countered the skeptical trend, and proved the necessity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holarship; thirdly, by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nd artifacts unearthed, it laid an empirical foundation for classics. In the contemporary academic context, archaeology will continue to supply new methodologies and materials for Chinese Classics, which will constantly generate new problem awareness and drive the renewal of research paradigms, thereby guiding modern Chinese Classics toward a more scientific path.

Keywords: classics; skepticism trend; archaeology

[责任编辑/观澜]